

利益“圈子化”，最严招投标成儿戏？

——聚焦一些大型项目招投标“违规三部曲”

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（记者 程士华 段续 姜刚）大型项目、大型央企、大额投资，与之相对应的本应是最严的招投标程序和监管，而这些项目却被曝问题重重，法定程序屡屡被“冲破”……记者调查发现，利益“圈子化”、程序“私人订制”、监管“真空化”等“奏响”了此类招投标的“违规三部曲”。

“圈内游戏”：“子孙”“兄弟”中标成“潜规则”

“招标成游戏，投标靠兄弟”，记者调查发现，作为“业界典范”的央企，本应执行最严的招投标规定，一些审计结果却显示，大型工程建设中的招投标乱象仍突出存在。违规招标、串标陪标、不公开招标已被部分央企视作“正常”，而这些项目大多被“圈内人”瓜分。

审计署披露的西电东送 21 个输变电项目审计结果中，不少项目被央企的“子公司”“孙公司”违规揽去。一些电网公司未经招标将部分工程直接发包给关联企业，涉及金额 34.39 亿元。

企业间本应公开招投标的项目成了只给“自己人”的“香饽饽”，招投标参与主体组成了一个外人难以进入的“熟人圈子”，利益输送更为隐蔽，招投标乱象丛生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项目法人南方电网公司指定该公司所属技术研究中心和科学研究院（两个单位是一套人马），承担三个项目的系统研究和成套设计。在无收费依据的情况下，确定合同金额为 4.66 亿元。实际上，两家单位无设计资质。

招投标项目给谁“自己说了算”。2012 年，中国海运（集

团）总公司所属中海集运和中海发展，在部分燃油、润滑油采购中未经过招标、询价、考察等程序，而由下属部门自行选择供应商。

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等指出，大型央企的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涉及多个领域，而这些领域往往隶属于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，有关信息分散、封闭，实际操作中存在多头管理、权责不明晰等问题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违规操作的机会。

程序“私人订制”：领导干部屡插手是“公开秘密”

违规介入让程序“为我所用”，一些领导干部亲自或间接过问工程建设已成“公开秘密”。

领导干部的一些亲朋好友也能介入其中。2013 年，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三峡集团公司进行巡视，发现的问题中，就包括一些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，招投标暗箱操作等。

在“授意”下，违规指定中标人的把戏不断上演。2005 年至 2011 年，中移动集团总部及山东移动等所属 8 家省公司 651 个工程建设项目存在违规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、擅自更改评标结果指定中标人等问题，涉及金额 342.66 亿元。

有的在准入要求上“量身定做”。“招标内容中会设定和项目有关的要求，很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来问题。”业内人士说，但实际上基本等同于为特定的关系公司“量身定做”。

受访专家表示，央企履行招投标程序流程是应有之义，而

近年来曝出的领导干部和亲友插手工程的案例，使得招投标规定沦为儿戏，巨额利益输送导致利润“缩水”，可能会影响到工程质量带来安全隐患。

监管“真空化”：整治招投标乱象不能仅靠“审计”

近年来，我国出台了招标投标法、合同法等法律法规，对工程建设等领域管理规范进行明确规定。然而，“年年审计、年年整改”的怪圈凸显，虽然每次出具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，但对其他企业难以形成震慑作用。

一些主管干部频频插手招投标项目，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同时充当起“圈子”的构建者和保护伞，专家建议，应构建政企分离的第三方招投标实施、监管机构，进行透明的项目进程披露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安徽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局长黄卫东表示，招投标领域腐败频出的一大原因在于执行环节，应将执行环节标准化、规范化。“灵活度越大，出问题概率越大，针对一些招投标的关键环节，可依据地方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标准设计，限制人为因素影响。”

黄卫东认为，在严肃惩处违规单位和个人的同时，制度健全及落实是防腐关键点，比如将“重审批轻监管”逐步转变为“宽准入严监管”，构建“标前+标中+标后”全程化和“体内+体外+社会”立体式的监管体系，强化制度和执行等环节齐抓共管。

图说中国

“夺刀少年”收到录取通知书



7 月 9 日，柳艳兵（右）和易政勇分别收到来自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当日上午，“夺刀少年”柳艳兵和易政勇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根据录取通知书内容，柳艳兵被南昌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，易政勇则入读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类专业。

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 摄

壶口瀑布迎来汛期



7 月 9 日，游客们在拍摄壶口瀑布。

进入 7 月份以来，受上游降雨和水库调节放水影响，壶口瀑布迎来汛期第一次涨水，壮丽的瀑布吸引了不少游客。

新华社记者 范敏达 摄

地质灾害频发

云南 10 天因灾死亡失踪 61 人

新华社昆明 7 月 9 日电（记者 李萌 鹿明广）记者采访了解到，目前，云南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主汛期，连日来怒江、丽江、大理等多个地区遭遇强降雨，导致泥石流、滑坡等灾害频发。自 6 月 30 日以来短短 10 天，已有 61 人因灾死亡或失踪。目前，各灾区正全力开展抢险搜救和群众安置工作。

9 日凌晨，云南大理州云龙县、怒江州福贡县等地都发生了泥石流灾害。截至记者发稿时，云龙县功果桥镇民主村已有 6 人死亡、8 人失踪，福贡县已有 17 人失踪，还有一些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到安全地带。

另据了解，6 月 30 日，福贡县发生一起山体滑坡，目前已造成 11 人死亡、4 人失踪。7 月 4 日，宣威市倘塘镇境内发生 1 起滑坡，造成 1 人死亡、2 人轻伤。7 月 6 日，丽江永胜县发生泥石流导致 5 人失踪

或死亡，当地 170 多名群众紧急转移安置。7 月 6 日以来，鲁甸县多个乡镇发生山洪、塌方、泥石流等灾害，在灾情较重的龙头山镇、乐红镇等地已有 4 人因灾死亡、5 人失踪。

从 6 月 30 日至 7 月 9 日，短短 10 天时间，上述云南各地发生的洪涝、塌方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已造成 61 人死亡或失踪。由于灾害突如其来，瞬间释放的能量剧烈，失踪人员通常是被冲走或掩埋，生还希望十分渺茫。

云南省气象部门有关人士介绍，每年 5 月至 10 月是云南的雨季，其中大部分地区会在 6 月至 8 月进入主汛期。由于云南山地面积超过 90%，地形地貌复杂，导致部分地区在主汛期经常会出现单点性强降水天气，极易引发的滑坡、泥石流、城市内涝等气象衍生灾害。

日本侵华战犯笔供

鹤野晋太郎：

把抗日军人当活靶

据鹤野晋太郎 1954 年 8 月笔供，他 1920 年生于日本广岛县。1941 年 4 月~9 月作为日本第 39 师团第 232 联队士兵到湖北汉口，其后回日本。1942 年 4 月~1945 年 5 月，在湖北任第 232 联队任职。1945 年 5 月任第 232 联队设营军官。同年 8 月被苏军俘虏。

重要罪行有：

1941 年 5 月 10 日，在湖北省荆门市南桥铺西北方，“侵入民宅，对 1 名中国人民强制要锅的时候，田中中尉走过来问‘干什么’，我告诉他说‘中国人民说锅早就被日本军掠夺去了’，田中说，‘他不听话把他杀了’”，“致使田中将该人击毙”。

1943 年 4 月，湖北省宜昌县天宝山，“有侵占该地的 8 中队所逮捕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 3 名（都是 25 岁左右），我用手枪打死 2 名，另 1 名指使同时撤退来的 7 中队岩左见习士官用手枪打死”，“有 7 中队逮捕来的 2 名抗日军战士及



居住于该地的中国人民农民 8 名，我命令同来的 7 中队 4 名士兵，‘太累赘了，将他们杀掉吧’，交给 2 大队配属工兵中队，把他们手脚绑起来扔入掩体壕内一起将他们炸死”。

1943 年 12 月中旬，在湖北省枝江县仁和坪，“捕来在该地居住的中国人民农民 1 名（40 岁左右），我先用 10 公分粗的方木插入脚和腿的中间，以使其跪着的方法进行了刑讯，后更用扁担向腿及脚殴打的方法进行刑讯，因膝盖关节脱节、大腿骨打断而致死”。

1944 年 4 月，在湖北省当阳县熊家坡，“在联队长命令之下，将在第一线盘踞的各大队逮捕押来后监禁中的抗日军战士 5 名（20 岁至 25 岁）和抗日军情报员 2 名（30 岁左右）做为 4 中队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，将活人刺杀了。我在这一屠杀中，亲自砍死 1 名抗日军情报员”。